

龍紋、渦紋、穀紋、蒲紋、乳丁紋 東周玉器主要紋飾的演變及定名，兼論《周禮》成書年代

楊建芳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古代玉器紋飾的種類不少，有些表面上看來大相徑庭，然而仔細深入研究，卻不難發現其間存在一定的關聯。東周玉器上的龍紋、渦紋、穀紋、蒲紋及後世的乳丁紋，便是如此。

龍紋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上便已經出現，至春秋時期甚為流行。春秋早期玉器上的龍紋，或頭、身、尾均雕出，或僅雕出頭部以象徵整體。多數龍紋為具象，龍頭的眼、眉(八字形)及上下顎都以雙鈎陰刻手法細致雕出。1、2、3(圖一：1-2)

春秋中期玉器上的龍紋，基本沿襲前期特點，但多數加雕向下伸吐的龍舌。4、5(圖一：3-4)此外，有些龍紋趨於簡化，上下顎相連呈S形。(圖一：5-6)這是一個較大的變化。

春秋晚期玉器上的龍紋，除少數保留具象外，多數呈簡化，甚至產生分解的現象。這是又一次的大變化。分解後的龍紋極難辨識。下面通過幾件春秋晚期玉器的紋飾，說明龍紋如何由具象逐步演變至分解。

第一件是江蘇吳縣春秋吳國窖藏出土的玉環。此環表面有七個淺浮雕龍紋，每一龍紋包括上下顎、眼、舌及身尾。身尾向下卷曲，疊壓於龍頭下面。6(圖一：7)

-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22，圖版貳玖：1。
- 2 楊鳩霞《安徽舒城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6期，頁62，圖一一(上左)。
- 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工作站、寶雞市考古工作隊《陝西隴縣邊家莊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11期，頁20，圖一四：1。
- 4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4期，頁314，圖一六：1-7、一七：16、19、31-35、二六：8、13、23、24。
- 5 關伯益《鄭冢古器圖考》，卷十，頁九，第五十一圖。
- 6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吳縣春秋吳國玉器窖藏》，《文物》，1988年11期，頁2-3，圖四：1，彩色插頁：2。

第二件是山西太原金勝村墓M251出土的玉環。此環表面有四個龍紋，每一龍紋包括一個具象的龍頭及渦紋、長尾蝌蚪紋與卷雲紋。後三者可能用以表示龍的身尾。(個別渦紋與卷雲紋也可能組成不完整的龍頭。)值得注意的是，龍頭的上顎(渦紋)與下顎(卷雲紋)僅以纖細的平行弧線連接，顯示二者藕斷絲連，即將分離。7(圖一：8)同樣的現象亦見於該墓出土的一件龍紋長方牌飾⁸及陝西旬陽縣楚墓出土的一件龍紋玉環⁹。(圖一：9-10)

第三件是河北邯鄲市百家村57號墓出土的玉環。其表面飾十二個(六對)簡化龍紋，有的雕出圓眼，有的其上顎(渦紋)與下顎(卷雲紋)已經分離，但龍頭形狀仍較易辨識。龍頭有一對長尾蝌蚪紋或一個側置的S形紋，應是身尾的簡化。¹⁰(圖一：11)類似的現象也見於同一墓葬出土的兩件龍形玉珩。¹¹(圖一：12-13)

第四件是山西長子縣牛家坡墓M7出土的玉璧。其表面有四組大致相同的紋飾。每一組紋飾為一徹底分解之龍形，但其上下顎、眼、角、耳等，仍可逐一辨識。¹²(圖二：1)類似的現象也見於同一墓葬出土的一件扁長牌飾。¹³(圖二：3)

第五件是浙江紹興市獅子山墓M306出土的玉環。其表面飾十組大致相同的紋飾。每一組紋飾包括七個不規整的渦紋。¹⁴(圖二：2)如果將此十組紋飾與上述牛家坡M7玉璧上的四組分解後的龍紋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前者實際是十個更簡化且分解了的龍紋。

發展至戰國早期，龍紋分解的現象已經極為普遍。例如，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其紋飾單元為渦紋及卷雲紋，實際是六個分解後的龍紋。每一個龍紋包含兩個由綉紋連接的渦紋，可能是上下顎。¹⁵(圖二：4)該墓出土的另一件玉璧，其紋飾單元為穀紋、卷雲紋、長尾蝌蚪紋和變形長尾蝌蚪紋(長尾向外折)。整個璧面的紋飾，可以區別為八個分解後的龍紋(沿內外邊緣各有四個)。¹⁶(圖二：5)類似的現象也見於河南洛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金勝村251號春秋大墓及車馬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9期，頁76，圖三四：1。

8 見注7，圖三五：6。

9 旬陽縣博物館《陝西旬陽發現戰國楚墓》，《文物》，1987年5期，頁52，圖七。墓中出土之龍紋玉環應屬春秋晚期玉器。

1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邯鄲百家村戰國墓》，《考古》，1962年12期，頁627，圖二二：3。按此墓應屬春秋晚期。

11 圖二二：1-2。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長子縣東周墓》，《考古學報》，1984年4期，頁516，圖一一：2。

13 見注12，圖一一：1。

1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1期，頁19，圖四〇，圖版伍：2。

15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403，圖二四五：2，圖版一五一：4。

16 見注15，圖二四五：1，圖版一五一：1。

陽市中州路墓M2717出土的一件繫璧¹⁷和山東臨淄縣郎家莊一號墓出土的玉管¹⁸。(圖三：1-2)

應當着重指出，上述曾侯乙墓和中州路墓M2717出土的玉璧上，初次出現淺浮雕穀紋。這種穀紋的「芽」較長，顯然由春秋晚期的渦紋演變而成。這從中州路墓M2717出土的一件玉珩紋飾可以得到印證。¹⁹(圖三：3)

進入戰國中期，龍紋分解現象已罕見，卷雲紋、長尾蝌蚪紋及變形長尾蝌蚪紋幾乎絕跡。玉器上普遍出現清一色的穀紋或渦紋，如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戰國中期墓出土的大型龍紋及穀紋玉璧，便是如此。²⁰(圖三：4)這些穀紋或渦紋的共同特點是：(一)雕於玉璧上的穀紋或渦紋，有些排列凌亂，有些則排列略為整齊；(二)穀紋或渦紋的形狀不甚規整，即同一件玉器上的穀紋或渦紋，其大小參差不齊；(三)穀紋的「芽」仍較長，與渦紋近似，像頭小尾長的蝌蚪。

玉璧上密集的大量穀紋或渦紋，其排列之所以能整齊有序，是由於事先在璧面上刻劃(或畫)出規則的菱形或方形的網格，然後在每一個網格內碾雕一個穀紋或渦紋。採用這種方法，始能保證眾多的穀紋或渦紋不致混亂。在曲阜魯國故城墓M58出土的一件大型龍紋及穀紋玉璧上，可以依稀看出穀紋區內刻劃的一些網格斜線。²¹(圖四：1)湖北光化縣五座墳出土的西漢穀紋玉璧，其上刻劃的斜線更為明顯。²²(圖四：2)據報導，河南輝縣固圍村一號戰國墓出土的一些穀紋玉環，其中編號1：354者「面篆穀紋，篆時先界作六角方格，然後加雕穀紋，篆跡清晰可辨。」²³又同墓出土的編號為331、342、358的三件玉環，其「六角界紋」或「甚著」或「不著」。²⁴

所謂「六角方格」或「六角界紋」，實際是將由斜線相交而成的菱形紋截斷其兩個銳角而形成。河北滿城縣西漢劉勝與竇綰墓²⁵及江蘇儀徵縣烟袋山漢墓²⁶出土的龍(鳳)紋及蒲紋

1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119，圖八二：7，圖版柒壹：1(上)。

18 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1期，頁79，圖九：2。

19 見注17，頁119-120，圖八二：5。

2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頁161-168，圖一〇九——一六，圖版玖伍一玖玖。

21 見上注，圖一一三。

22 湖北省博物館《光化五座墳西漢墓》，《考古學報》，1976年2期，頁167，圖二二：1。

2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3月，頁81。

24 見上注，頁81，表五八。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293，圖一九九：2，圖版二一〇：2。

26 南京博物院《江蘇儀徵烟袋山漢墓》，《考古學報》，1987年4期，頁485，圖一五：1。

玉璧，其上面的六角形格正可以說明這一點。(圖四：3)前者出土的一件穀紋玉璧足以證實上述的解釋。²⁷(圖五：1)

到了戰國晚期，清一色及排列整齊的穀紋或渦紋更為流行，其特點與前期者基本相同，只是排列更加整齊，有的穀紋其「芽」極短，全形似頭大尾短的蝌蚪。²⁸(圖五：2)秦漢玉器也如此。^{29、30}(圖五：3)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出現極少數蒲紋玉璧。其一出自安徽長豐縣楊公墓M8。其內外邊緣有廓，璧面有由陰刻斜線相交而成的菱形網格，網格內有六角形凸起。³¹(圖五：4)另一件出自湖南長沙市五里牌楚墓，其蒲紋特點與楊公出土者類似，但較為粗糙。³²(圖五：5)

蒲紋是如何形成的？前面論述戰國中期穀紋璧時已經指出：為了使穀紋或渦紋排列整齊，在碾雕之前，先在璧面上刻劃許多斜線。這些斜線相交形成許多菱形格。若將每一菱形格的兩個銳角截斷，即成為許多凸起的六角形。如果凸起的表面不加雕穀紋或渦紋，則整個璧面便呈現出蒲紋。(圖六：2-3)其實，有的考古工作者也觀察到這種現象。例如，西安市北郊西漢墓出土的一件龍紋及蒲紋玉璧，有關報導便明確提到：「內區是蒲紋，即是先刻出斜線，再沿格線琢碾出一個六角形圖案。」³³由此可見，蒲紋的出現與清一色的穀紋或渦紋的琢磨有關。故前者的出現晚於後二者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蒲紋雖在戰國晚期出現，但卻罕見，至西漢前期才流行。^{34、35、36、37、38、39、40}(圖六：1)

27 見注25，頁293，圖一九九：4，圖版二一：1。

28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長豐楊公發掘九座戰國墓》，《考古學集刊》，第2集，1982年，頁55，圖七：1。

29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左家塘秦代木槨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9期，頁458，圖四。

30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子房山西漢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4集，頁62，圖六：3。

31 見注28，頁56，圖版拾陸：6。

32 楚文物展覽會編《楚文物展覽圖錄》，北京：北京歷史博物館，1954年，頁27，圖五一。

33 王長啓、孔浩羣《西安北郊發現漢代墓葬》，《考古與文物》，1987年4期，頁41。

34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頁169、238-239，圖一〇〇：4-5、一四三：1，圖版四二：3-4、六七：5。

35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嬭墓》，《文物》，1979年3期，頁4，圖二〇一二二。

36 見注25，頁133、134、262、294，圖九四：2、3、5、九四：1、2、5、一七七、一九九：1、2、5、6、7。

37 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西漢崖洞墓》，《文物》，1973年4期，頁26，圖一〇及三七：3。

38 見注26。

39 張安禮、曹立《莒縣發現西漢玉璧》，《考古》，1989年6期，頁552，圖一。

40 山東省荷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巨野紅土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83年4期，頁491，圖一九：3-4，圖版貳拾：2。

至於乳丁紋，不過是淺浮雕穀紋失去「芽」所致。換言之，前者是後者蛻變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清一色及眾多的乳丁紋的出現，不僅比穀紋而且也比蒲紋為晚，在西漢晚期及東漢的玉器上才出現。⁴¹、⁴²(圖六：4)(個別的乳釘紋在戰國時期會偶然出現，但非常罕見。)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見龍紋、渦紋、穀紋、蒲紋和乳丁紋，儘管看來毫不相關，實際上卻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繫。(圖七)

著名美術史家羅越(Max Loehr)教授根據傳世玉器及少量出土玉器，分析東周淺浮雕穀紋的出現和式微，得出與筆者上述大致相同的結論。⁴³彼此依據的資料和使用的方法都不相同，但卻達致基本相同的認識，可說是殊途同歸。以今日較多的出土玉器來衡量，羅氏的某些論斷似有修正的必要。例如，羅氏以湖南長沙出土的刻有網格和圓圈紋(或圈點紋)的西漢玉石璧之出現，作為淺浮雕穀紋結束的界限。(見羅書頁22)這種論證和判斷都頗可商榷。

按東周玉雕可區別為中原式、秦式、越式和夷式。⁴⁴、⁴⁵、⁴⁶、⁴⁷、⁴⁸、⁴⁹上述圓圈紋或圈點紋是越式玉器流行的紋飾，淵源於越族的幾何印陶的圓圈紋或圈點紋，是用管鑽法作成的。這種越式璧分佈於湖北、湖南和嶺南地區，是古越族的玉器，最早出現於戰國中期，至東漢晚期才式微。⁵⁰、⁵¹龍紋、穀紋等為中原式玉器流行紋飾，而且都由碾琢而成，隨着中原文化的傳播而遍佈東周各大國。故傳世東周玉器什九都屬中原式。因此，無

41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邢台南郊西漢墓》，《考古》，1980年5期，頁404，圖一(左)。

42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43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11期，頁11，圖四，圖版貳：1。

43 Max Loeh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p. 21-28.

44 楊建芳《春秋玉器及其分期——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四》，《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8卷，1987年，頁1-30。

45 楊建芳《戰國早期玉器——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9卷，1988年，頁21-44。

46 楊建芳《論陝西先秦玉雕之特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卷，1989年，頁5-7、10-12。

47 楊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1989年，頁161-176。

48 楊建芳《戰國兩漢越式璧》，《故宮文物月刊》，第9卷7期，頁72-79。

49 楊建芳《東周夷式玉器初探——中國古玉分域研究之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1990年，頁143-152。

50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4月，頁114，圖九二：1及3。

51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常德東漢墓》，《考古學集刊》，第1集，1981年，頁173，圖版貳捌：4。

論從玉器的族屬或紋飾的作成方法而言，圓圈紋或圈點紋都與穀紋迥然不同。以越式玉器的圓圈紋或圈點紋的出現，來說明中原式玉器上的穀紋的式微顯然不妥。何況越式玉器的圓圈紋最早出現於戰國中期，圈點紋最早見於戰國晚期，與羅氏強調圓圈(或圈點)紋屬西漢時期也不相符。

又如羅氏在確定東周紋飾的年代方面似乎頗細緻(見羅書頁28, I—XII類紋飾年代), 但有些與實際出入較大。例如, 清一色而且排列整齊的淺浮雕穀紋, 被定為公元前第五至第四世紀(見羅書頁28, 第IX類紋飾年代), 即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至戰國中期。然而根據大量東周玉器的分析, 這種穀紋最早出現於戰國中期, 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並無清一色且排列整齊的穀紋。⁵²此外, 這種紋飾在西漢仍相當流行,^{53、54、55、56、57}東漢時尚可見到,⁵⁸極大地逾越羅氏所確定的下限年代(公元前第四世紀)。總的說來, 羅氏在年代估計方面有偏早的傾向, 宜作適當調整, 否則難免出現削足適履的缺憾。

長時期以來, 學者一直將玉器上的穀紋視為穀粟的象徵, 而蒲紋則是蒲席的模仿。這些見解實源於漢唐經師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宗伯》:「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鄭玄注云:「穀, 所以養人; 蒲為席, 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 或以蒲為瑑飾。」⁵⁹又《典瑞》:「穀圭以和難, 以聘女。」鄭玄注云:「穀圭, 亦王使之瑞節。穀, 善也, 其飾若粟文然。」唐賈公彥疏云:「知飾若粟文者, 以其稱穀, 若穀粟然也。」⁶⁰正是在這些說法的影響下, 宋人聶崇義於《三禮圖·玉瑞圖》中, 居然將穀紋繪成穗禾狀, 而蒲紋則呈蒲草狀。

然而, 據前面的論述, 穀紋實由渦紋發展而成; 後者卻是龍紋分解後所派生的紋飾。因此, 穀紋與五穀中的穀粟, 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漢唐經師及宋儒將穀紋視為穀粟的象徵, 顯然出於臆想, 並不正確。

52 見注44、45。

53 湖北省博物館《雲溪大墳頭一號漢墓》,《文物資料叢刊》,第4集,頁13,圖四二:3及六六。

54 見注30。

55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廣州淘金坑的西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1期,頁166,圖版壹肆:1。

56 廣州市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穗港漢墓出土文物》,香港,1983年,頁180—181,圖66。

57 黎金《廣州市先烈路發現西漢至唐古墓五座》,《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6期,頁81,圖四(下)。

58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北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2期,頁147,圖二〇:2,圖版捌:2、玖:2。

59 見《周禮注疏》,乾隆四年校刊本,卷十八,頁二十五至二十六。

60 見同上注,卷二十,頁二十八。

同樣，前面的論述也闡明蒲紋的出現與保證清一色及眾多的渦紋或穀紋排列整齊有關，而與用於「安人」的蒲蓆絲毫無關。玉器蒲紋與蒲蓆的編織紋，驟然看來頗為相似。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二者的差別仍大。例如，蒲蓆的編織紋不可能有中空六角形（尤其是眾多而又排列整齊的中空六角形）。其次，六角形上下或左右的小三角形（菱形紋銳角被截而形成），在蒲蓆編織紋中，不可能與六角形伴生。這些也足以說明玉器蒲紋並非蒲蓆編織紋。因此，漢唐經師及宋儒將玉器蒲紋視為蒲蓆編織紋的模仿，無疑也出於臆想和附會，同樣不足採信。

考古學家夏鼐教授曾在其論文中籠統地提到漢代經師對玉器釋名望文生義的缺點，卻未具體指出穀紋和蒲紋命名的不妥，更沒有否定「穀可養人」，「蒲可安人」等說法，只是指出聶崇義在《三禮圖》中將穀紋和蒲紋繪成禾穀和蒲草的錯誤而已。⁶¹、⁶²因此，穀紋和蒲紋的傳統涵義（上引鄭玄和賈公彥的解釋），迄今並未受到懷疑，更遑論指陳其不當。

玉器上的穀紋和蒲紋既非穀粟和蒲蓆的象徵，則其定名（穀紋、蒲紋）便頗可商榷了。不過，穀紋與蒲紋二名稱使用已久，大家比較熟悉，如果摒棄舊說而賦予新的涵義（見前面的論述），仍不妨沿用。這樣可以避免重新定名引起的混亂。

三

《周禮》是我國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關於其成書年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晚近的研究多主張成書於戰國時期，⁶³、⁶⁴、⁶⁵也有認為成書於秦始皇帝之世⁶⁶或西漢⁶⁷。鑒於《周禮》多處涉及玉器，本文從玉器紋飾的角度探討其成書年代。（順便提到，日本學者林巳奈夫教授曾有多篇論文涉及《周禮》，但都限於《周禮》所提到的玉器種類和用途，並未利用玉器紋飾探討此書的成書年代。）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

61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5期，頁455—456。

62 夏鼐《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1983年2期，頁127—128。

63 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見其所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年7月再版，頁285—434。

64 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文史》，第六輯，頁40。

65 楊天宇《〈周禮〉之天帝觀考析》，《中國史研究》，1990年4期，頁119—128。

66 陳連慶《〈周禮〉成書年代的新探索》，載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二），頁50。

67 彭林《〈周禮〉五行思想新探》，《歷史研究》，1990年3期，頁16。又見其《周禮成書於西漢說》一文，載《史學史研究》，1989年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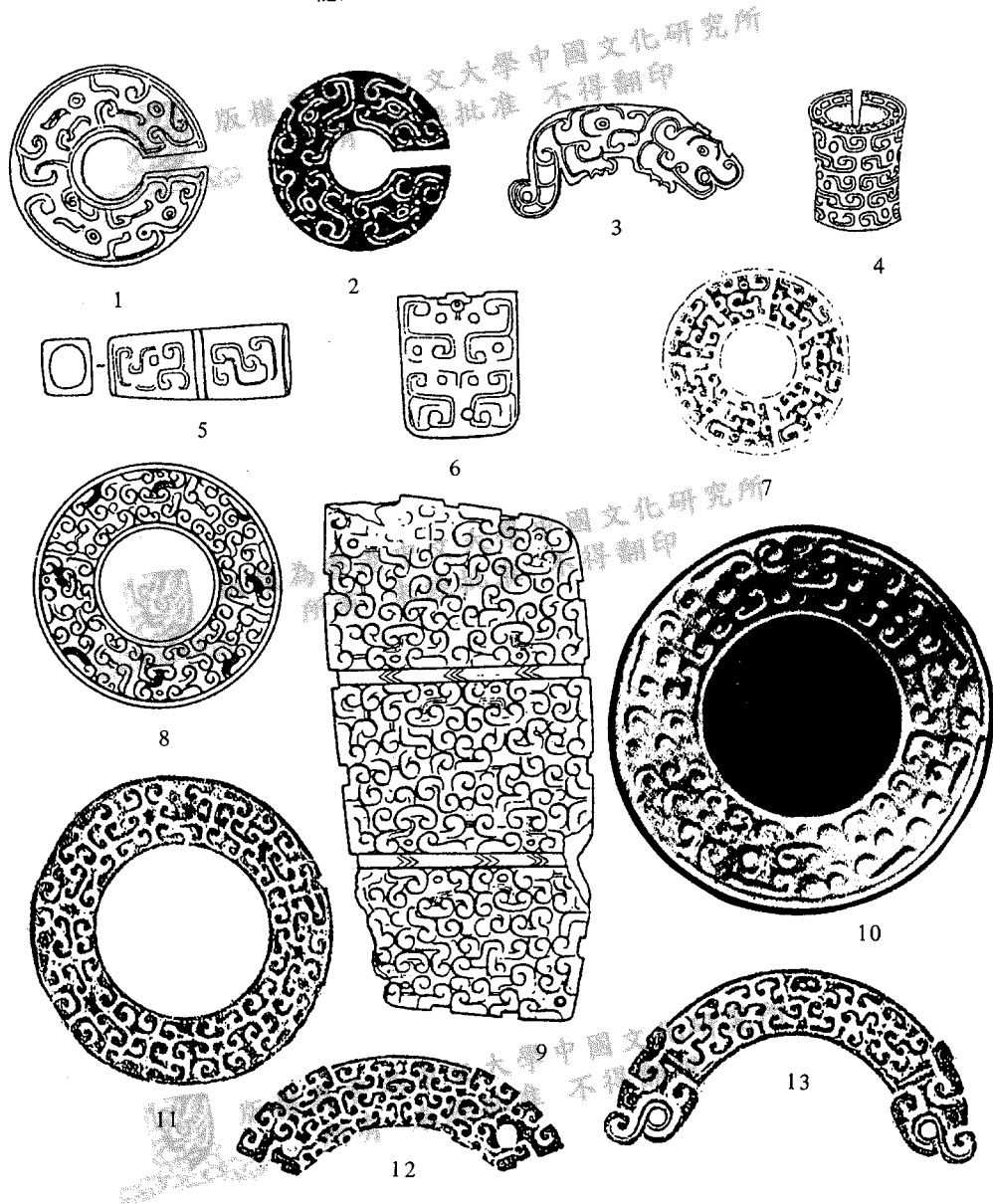
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所謂「穀璧」應指穀紋璧而言；而「蒲璧」應即蒲紋璧。

由前面的論述，可知當春秋晚期龍紋分解，其派生物之一的渦紋進一步演變而成爲穀紋。清一色的穀紋璧（即通常所謂的穀璧）在戰國中期才有。至於蒲紋，遲至戰國晚期始出現，而且頗爲罕見，至西漢中期（武帝之世）方廣泛流行。《周禮》既提到「蒲璧」，則其成書年代當不早於戰國晚期，而且很可能是西漢前期。

然而，實際情形也許要複雜得多。顧頡剛先生曾指出：《周禮》「這書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時」，又說《周禮》「原是一部戰國時的法家著作，在散亡之餘，爲漢代的儒家所獲得，加以補苴增損，勉強湊足了五官。……」⁶⁸（其他學者因《周禮》內容過於龐雜，也主張此書非出於一人之手。⁶⁹）如果顧先生這些見解是正確的話，我們便有必要考慮上引《周禮》六瑞說是否漢儒補苴進去這一問題。遺憾的是，迄今尚無答案。在未能證實《周禮》六瑞說爲漢儒的創作之前，似不應排除《周禮》成書於戰國晚期乃至西漢前期的可能性。

68 見注64，頁38及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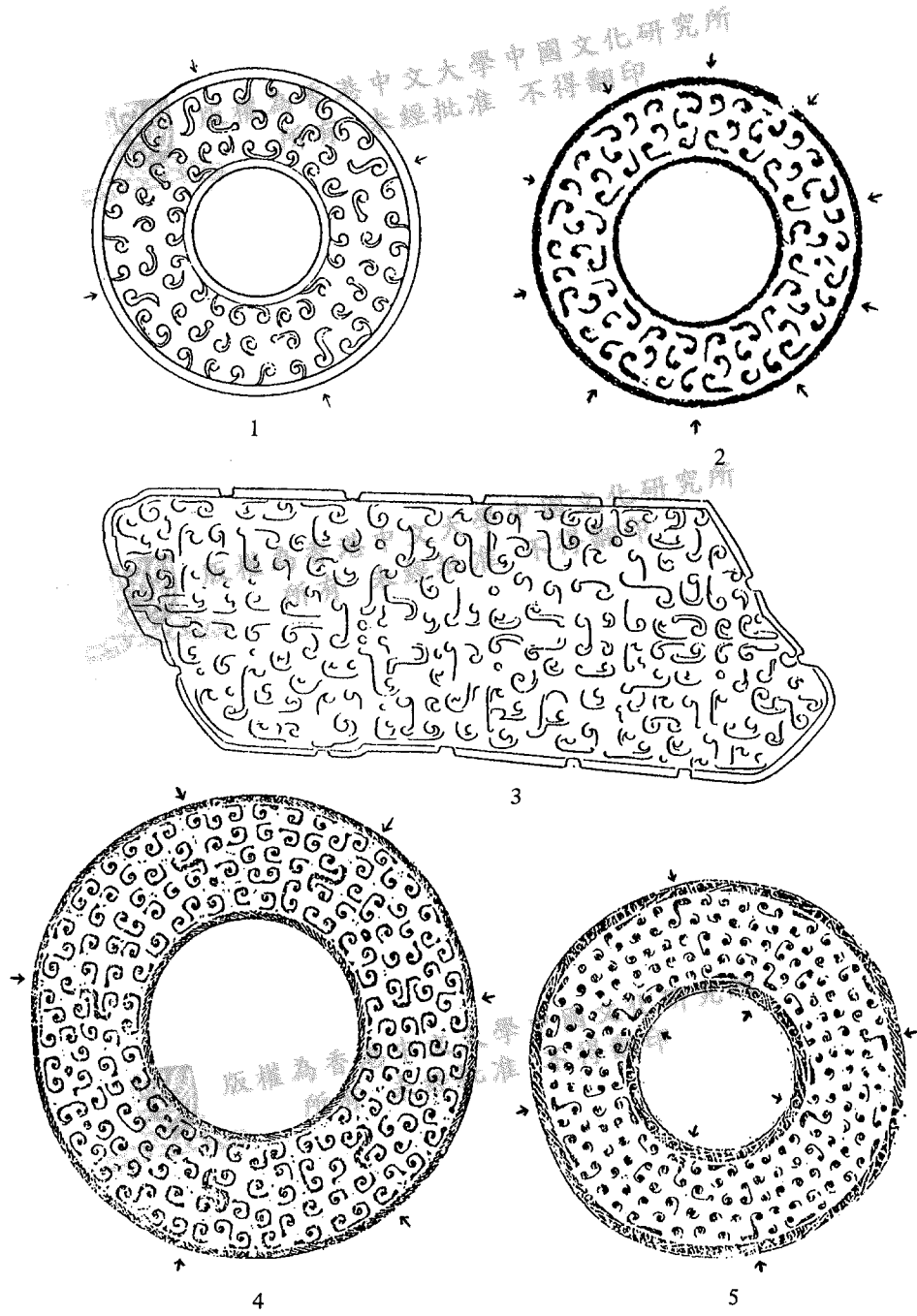
69 侯家駒《周禮批判》，《大陸雜誌》，第69卷6期，頁5—15；又見其所著《周禮研究》一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6月，頁375—376。



圖一

1. 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墓M1723出土 2. 安徽舒城縣河口墓M1出土
 3、5、6. 河南光山縣黃君孟夫婦墓出土 4. 河南新鄭縣李氏園中古墓出土
 7. 江蘇吳縣春秋吳國窖藏出土 8、9. 山西太原市金勝村墓M251出土
 10. 陝西旬陽縣楚墓出土 11、12、13. 河北邯鄲市百家村墓M57出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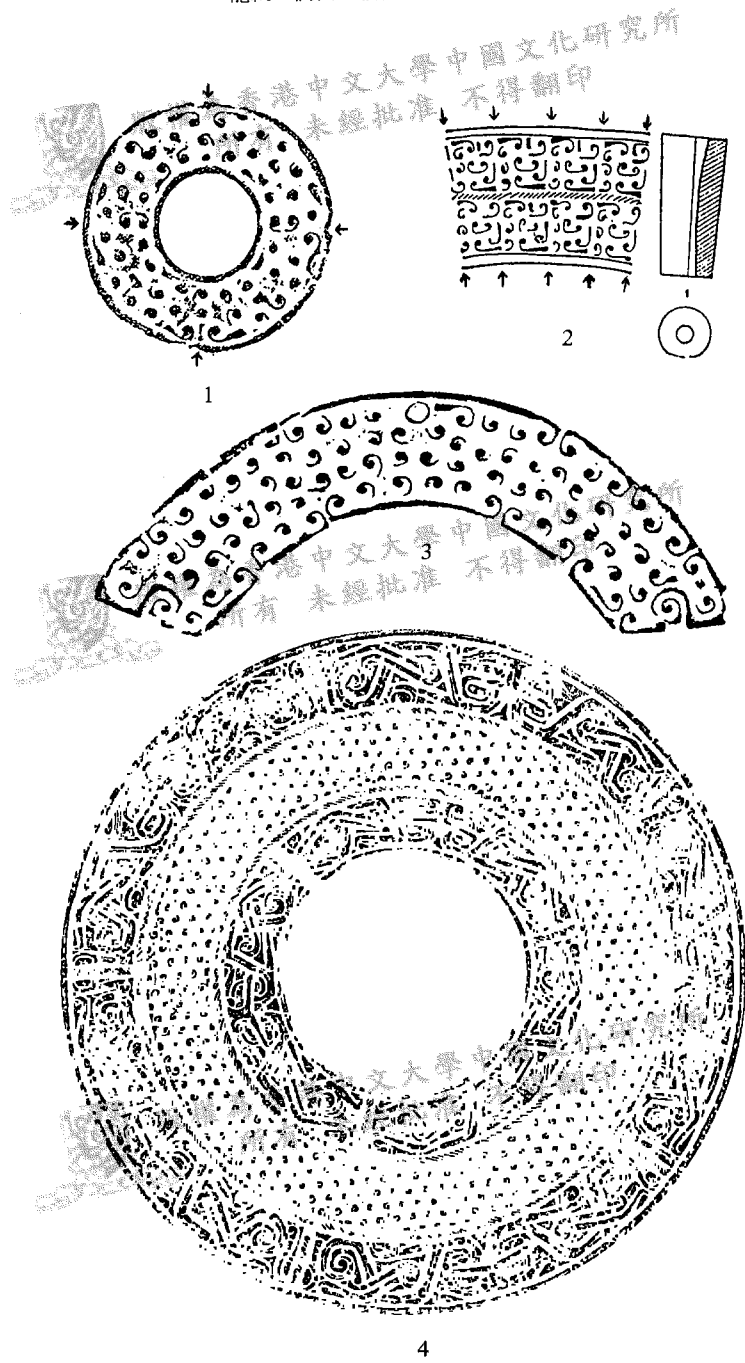


圖二

1、3. 山西長子縣牛家坡墓M7出土 2. 浙江紹興市獅子山墓M306出土

4、5. 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

1、3. 河南洛陽中州路墓M2717出土 2. 山東臨淄縣郎家莊墓M1出土
4. 山東曲阜縣魯國故城墓M52出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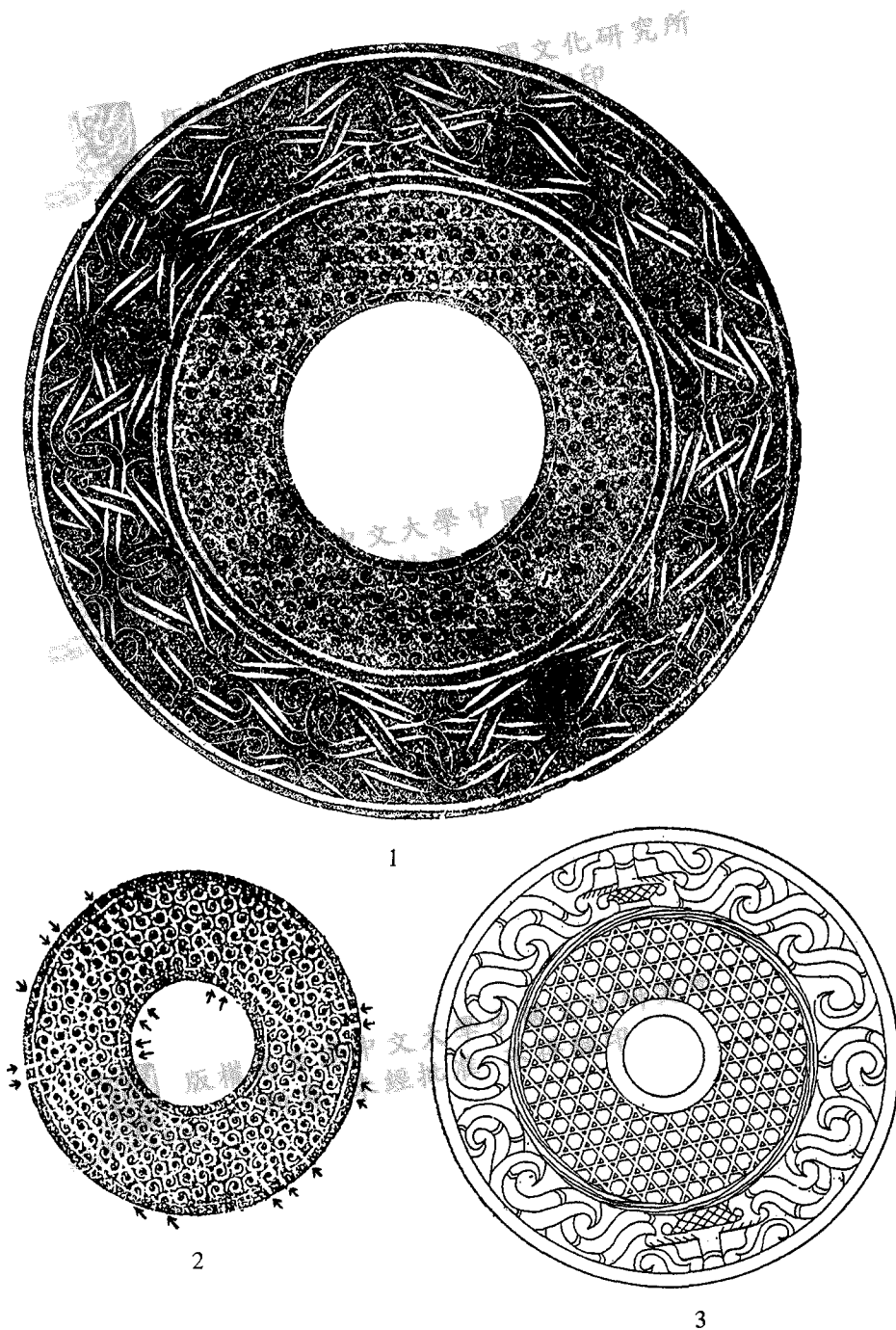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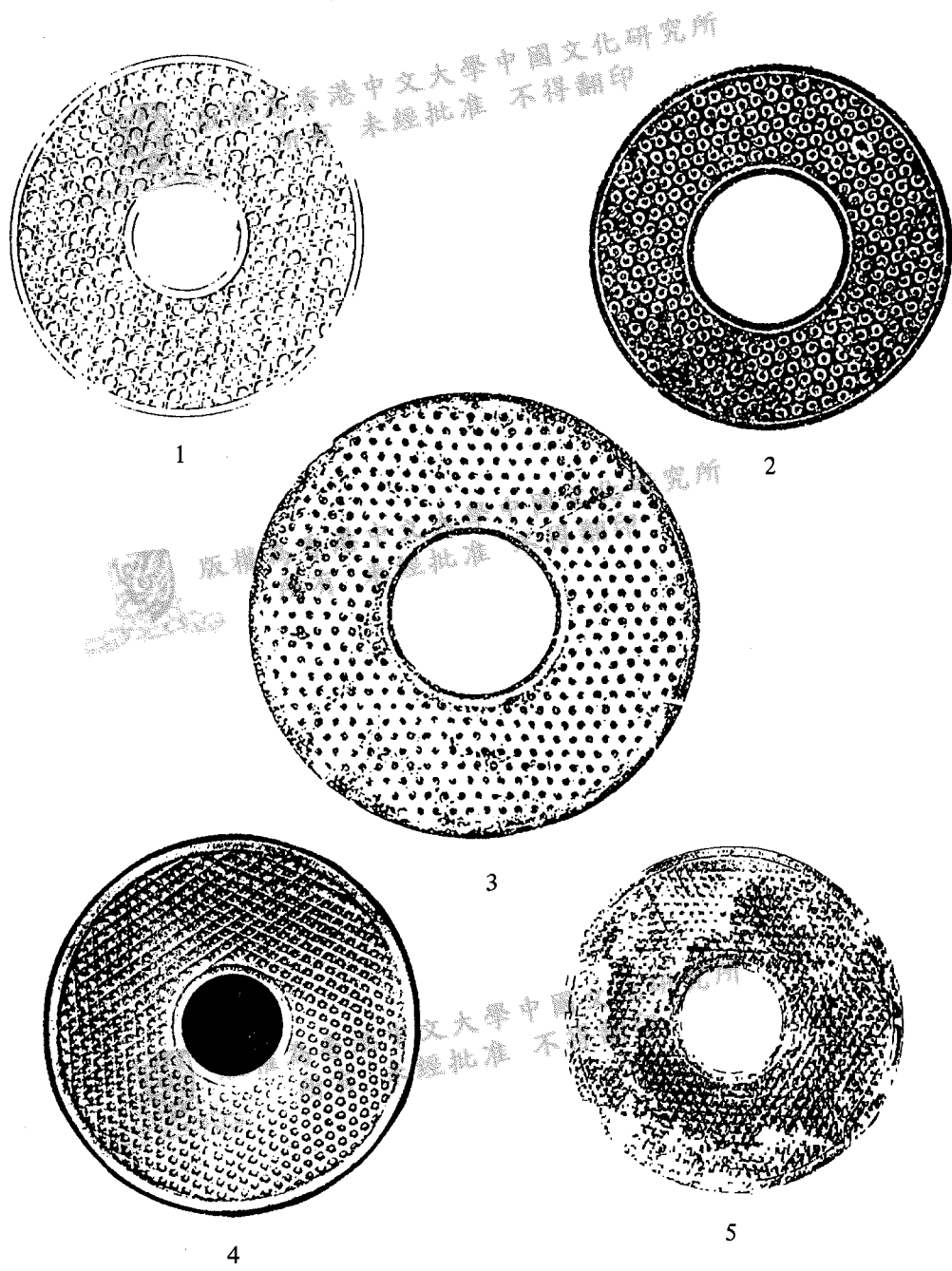


圖 四

- 1. 山東曲阜縣魯國故城墓M58出土
- 2. 湖北光化縣五座墳墓M3出土
- 3. 江蘇儀徵縣烟袋山墓M1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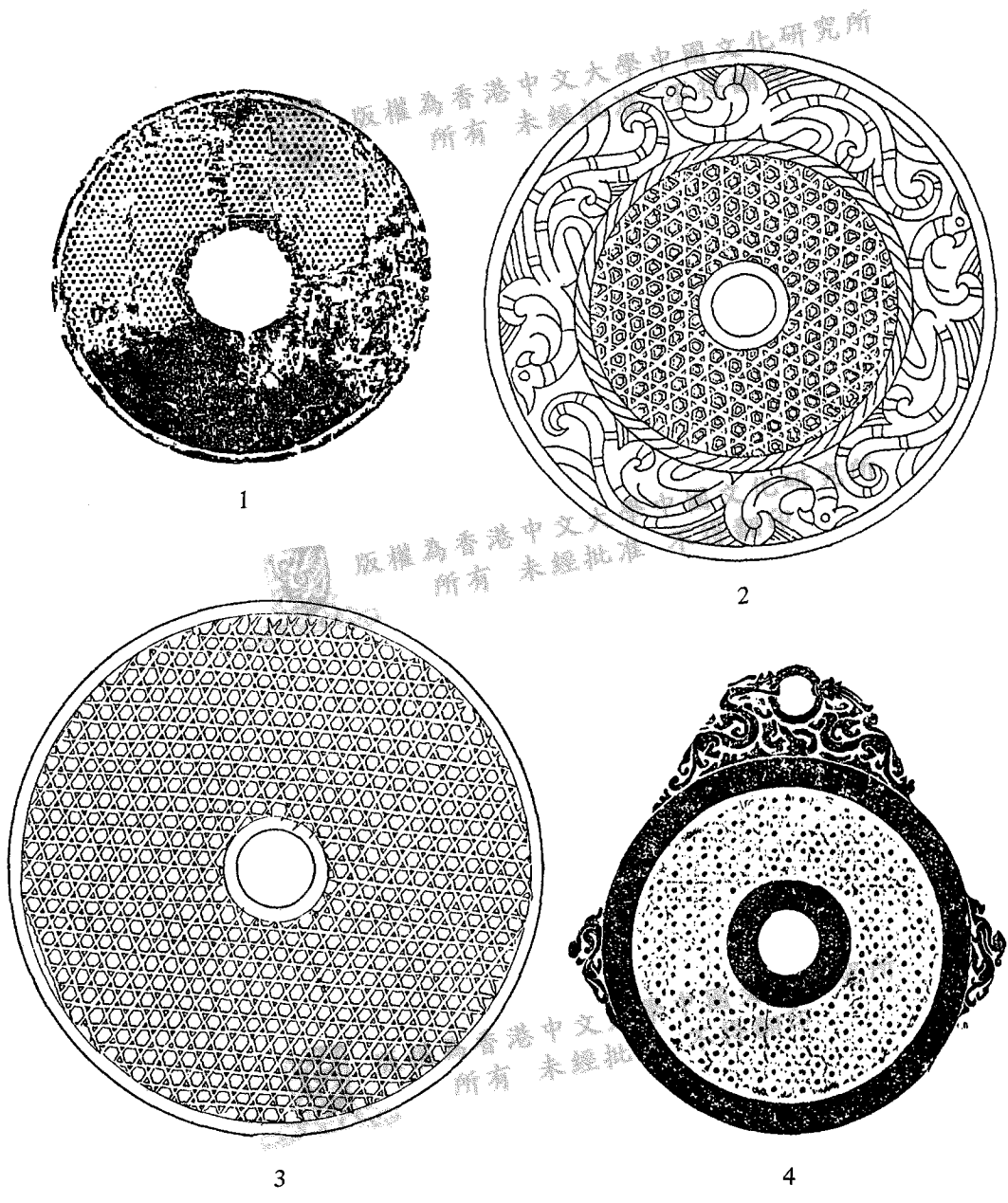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 1. 河北滿城縣竇綰墓出土
- 2. 安徽長豐縣楊公墓M9出土
- 3. 江蘇徐州市子房山墓M3出土
- 4. 安徽長豐縣楊公墓M8出土
- 5. 湖南長沙市五里版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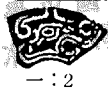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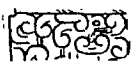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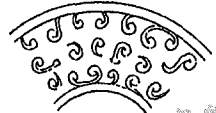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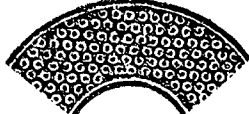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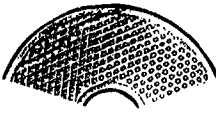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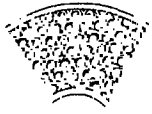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六

- 1. 廣東廣州市麻鷹崗墓M1145出土
- 2、3. 河北滿城縣寶綰墓出土
- 4. 河北定縣墓M43出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春秋早期	 <p>—:2</p>
春秋中期	  <p>—:3 —:5</p>
春秋晚期	    <p>—:7 —:8 —:9 —:10</p>      <p>二:3 —:11 —:12 二:1 二:2</p>
戰國早期	    <p>三:2 二:5 二:4 三:1</p>
戰國中期	 <p>三:4</p>
戰國晚期	  <p>五:2 五:4</p>
西漢早期	  <p>五:3 六:1</p>
西漢中期	  <p>五:1 六:3</p>

圖七 龍紋之演變(附蒲紋)

紋飾圖下之數字為本文插圖之編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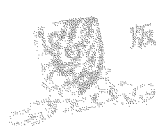
On Dragon, Whorl, Grain, Mat and Nipple Patterns:
The Development and Nomenclature of the Surface
Decoration of Eastern Chou Jades, together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Chou li*

(A Summary)

Yeung Kin Fong

From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jade articles of the Eastern Chou and the Han period excavated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dragon pattern began to degenerate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upper and lower jaws, eyes and horns of the dragon became whorl, grain, cirrus and long-tailed tadpole patterns etc. and we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were grain and mat patterns only and were arranged in order. The mat pattern was only a net pattern whose purpose is to ensure that the grain pattern was arranged in order. This suggests that the so-called "grain" pattern is in fact not "millet" pattern and the "mat" pattern not "cattail mat" pattern.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riginating from the Han-T'ang commentators on the Classics was that the so-called "grain" and "mat" patterns were intended to be natural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se terms. The author shows this not to be the case. He furthermore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the dating of the *Chou li*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 periodisation of the mat pattern. Because the mat pattern was rare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as not popular until the early Han, appearance of mat pattern in the *Chou li* points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was compiled not earlier tha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